

朱志先◎著

明人汉史学研究

Ming Ren Han Shi Xue Yan Jiu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十一五』规划资助课题
[2010]153

K234
10

明人汉史学研究

朱志先◎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人汉史学研究/朱志先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5

ISBN 978 - 7 - 216 - 06796 - 6

- I. 明…
II. 朱…
III. 中国历史—研究—汉代
IV. K23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6084 号

明人汉史学研究

朱志先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数:432 千字
版次:2011 年 5 月第 1 版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6796 - 6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26.5
插页:1
印次: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序

朱志先博士的《明人汉史学研究》，是个具有相当研究难度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仅它的研究对象就令人十分纠结，既要研究《史记》、两《汉书》等记载汉史的文本，又要研究这些文本所载录的汉代历史本身，并且不是直接对以上两个层面的问题进行研究，而是对明人在以上两个层面研究的成果进行研究，这就构成了学术研究的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汉代历史本身，第二个层次是记载汉代历史的载体《史记》、两《汉书》等史学文本，第三个层次是明人对汉史文本《史记》、两《汉书》及其载录的汉代历史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第四个层次则是朱志先博士对明人在研究汉史及其载录文本《史记》、两《汉书》上取得的成果进行的研究活动。这样一个前后相继的研究过程，形成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黄雀捕螳螂，猎人更在后”的连环效应，使汉代历史、明代历史和今人的学术活动系连一线，使中国学术史呈现现代代相传的活力和生生不息的魅力。

朱志先博士深知这一选题的复杂性，在研究中十分小心和谨慎，在开篇的“概念界定”中，特别指出：“明人指曾经在明代生活较长时期，并受明代社会意识影响的人，包括服务于明朝的元朝遗老、明朝人及明遗民。”“汉史学指后人对两汉的历史事实及其载录文本（《史记》、《汉书》、《后汉书》、《汉纪》、《后汉纪》、《东观汉记》、《资治通鉴》等），进行学习、评论、考证、论述、刊刻、节录、摘抄等整理及研究活动所形成的成果和学问。”“明人汉史学则是指明人对汉代史实及其载体的研习活动及其成果。”并清晰地指出“本论文涉及以下四个层面的内容：第一，汉代历史及其载录文本（即明人汉史学研究之对象）；第二，明人对汉代历史及其载录文本的研习及其成果（即明人汉史学）；第三，明人汉史学对明代史学、学术、文化及社会的影响（即明人汉史学研究的社会价值）；第四，明人汉史学对清人的影响（即明人汉史学研究的历史地位）。”显然，他自己是非常清楚这个选题的难度系数，但他仍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置之死地而后生”。经过三年艰苦而艰辛的奋斗和努力，他终于完成了这部高难度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全票优秀的结果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并受到答辩委员们的一致好评和赞誉。朱志先是我的开门博

士弟子，是我在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招收的中国文化史专业的博士生，供他选择的题目很多，但他偏偏选中了具有如此难度的《明人汉史学研究》，并以优秀的论文成果和优异的成绩证明了自己做学问的能力，表达了知难而上的勇气和信念。在做论文的三年里，他以顽强的毅力，长期泡在武大老图书馆的特藏室里，翻阅明人的文集和学术笔记，在四周寂静无声的环境里，与明人相接，并通过明人远交汉人，沉浸于学术海洋里，忘记了时间，不知夜之将至，将世俗的浮躁和生活的困难，远远抛诸脑后。对于他的勤奋和努力，老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有目共睹，同学和老师们也交口称赞。正在他做论文的过程中，女儿出生了，他一边负起做父亲的责任，一边坚持不懈地从事论文的写作。一旦将家中老人接来照料女儿和妻子，他马上又赶回学校继续资料的查找和博士论文的撰著。作为第一个博士弟子，他的论文以扎实、厚重的面貌示人，为以后的博士弟子也立下了标杆，成为他们仿效的典范，可以说是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现在，朱志先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他的心血马上就要结出硕果，我为此深感欣慰和由衷高兴。祝愿他在未来的学术生涯中扬帆远航，达到更远的目标，取得更大的成就！

是为序。

谢贵安

撰于珞珈山麓、东湖之滨

2011年3月8日

目 录

绪 言	1
一、选题意义	1
二、学术史回顾与前瞻	4
三、文章结构与思路	11
四、创新点和难点	15

上 编 鉴往知来与劝善惩恶思潮下汉史研习 的实践功能与道德价值

第一章 朱元璋对汉史的研习与应用	20
第一节 朱元璋关注汉代历史的原因	20
一、元末明初的社会现实	20
二、朱元璋的个人经历	21
第二节 朱元璋研习汉代历史的表现	22
一、与子孙交流中研习汉史	22
二、与大臣讨论中研习汉史	24
第三节 汉史对朱元璋的影响	27
一、正面影响	27
二、负面影响	34
第二章 明前期大儒与汉史学	39
第一节 王祎对汉史“考订同异”、“瑕瑜不掩”	39
一、“考订同异”:缕清汉史文本之差异	39
二、“瑕瑜不掩”:还原汉史原貌	43

2	第二节 方孝孺对汉史“会其通而不泥于一志”	46
	一、质疑《史记》之所载	47
	二、从治世角度论析《盐铁论》、《申鉴》	48
	三、从反对苛政的角度批判《政论》	49
	四、“圣人之道，与时偕行”：关注汉史的借鉴功能	50
	第三节 考古证今、补偏足全：丘濬对汉史的探讨	53
	一、“考古以证今，随时而应用”：以汉史比附明代政治	54
	二、“积小以成其大，补偏以足其全”：对汉代历史现象的归纳	59
	三、“扶持世教，警省人心”：对汉史的鉴戒	62
	第三章 “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史鉴书编纂与汉史研究	66
	第一节 明初敕撰史鉴书对汉史的探讨	66
	第二节 “崇实黜浮，鉴别悉允”：明前期士人述汉史	69

中编 明中叶文学复古运动影响下《史》、《汉》的

艺术性借鉴和学术性考释

05	第一章 《史》、《汉》的比较研究与吸收	78
	第一节 《史》、《汉》比较研究	78
	一、“《史记》以风神胜”：《史记》著作风格评析	79
	二、“《汉书》以矩镬胜”：《汉书》著作风格评析	86
	三、班、马之优劣	89
	第二节 《史》、《汉》风格吸收	95
	一、史书编纂中《史》、《汉》风格的借鉴	95
	二、文学创作中《史》、《汉》风格的模拟	105
	第二章 明中期汉史评论的兴起	116
	第一节 “专据经传以绳史”：《尚论编》中的汉史评论	116
	一、“抉定其抵牾，使相统一”：重评汉史，提出己见	117



二、“扬微阐幽，的的可表”:从细微处探讨汉史的本质	119
三、借托汉史，风切当世	120
四、保存汉史史料之功用	122
第二节 “折衷机宜，如指彀的”:《史说》中的汉史评论	124
一、“若考据，皆前人究括所未及”:汉史研究独具心得	124
二、汉史评论超越先儒	126
三、“援彼证否判于析尘”:通过史实援引揭示历史真相	128
第三节 “阐摘精奥，剖析疑义”:《古史要评》中的汉史评论	131
一、对汉史的“同情之理解”	132
二、剖析汉史研究中之疑义	133
三、以儒家为指针评判汉代史实	136
第三章 “闻见溢而考索真”:嘉、隆间汉史考证之学的兴起	138
第一节 柯维骐《史记》考证中的“别淆乱订是非，会万于一”	138
一、指陈《史记》记载的不确之处	139
二、对《史记》编纂体例和主题的考证	142
三、归纳《史记》叙事的方法	145
四、研究汉史不囿于成说	146
第二节 杨慎“搜奇抉谲，撷采钩隐”以考汉史	147
一、考究汉代名物	148
二、探究汉史，不泥旧说	152
三、补充汉史文本注释之所未及，驳正改窜之所讹谬	154
四、考证《史》、《汉》版本之误	156
五、考辨汉代史学著作之误	157
第三节 陈耀文的汉史辨证“抉摘其失，兼资考据”	161
一、“是非之公”，“随事辨正”:对汉史史事的考辨与正误	162
二、对汉史文本“远讨遐搜，潜心训诂”	165
三、陈耀文对杨慎汉史考证之“深文苛索，有意求瑕”	168
第四章 《史》、《汉》研究之荟萃:《史记评林》与《汉书评林》	174
第一节 《史记评林》与《史记》研究	174
一、《史记评林》的产生	174

二、《史记评林》内容及撰写方法	176
三、凌稚隆的《史记》研究	178
四、《史记评林》的总体评价	184
第二节 《汉书评林》与《汉书》研究	186
一、《汉书评林》的产生	186
二、《汉书评林》内容及撰写方法	187
三、凌稚隆的《汉书》研究	189
四、《汉书评林》的总体评价	200
第三节 史汉《评林》时代不带考评的汉史整理著作	202

下编 明后期理学裂变下汉史学的多样化趋向

第一章 晚明对汉代历史的评析	208
第一节 通史编纂中汉史评论	208
一、“程量今古，独出胸臆”：《藏书》评汉史	208
二、“别善败如列眉，烛忠佞如观火”：《读史漫录》评汉史	216
三、《藏书》与《读史漫录》研究汉史的差异	225
四、其他通史著作中的汉史评论	226
第二节 断代史编纂中汉史评论	236
一、“比人缀事，各具端委”：钟惺《史怀》的汉史评论	236
二、其他断代史著对汉史的评论	245
第三节 有关文集、笔记中的汉史评论	247
一、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的汉史研究	247
二、晚明其他笔记、文集中的汉史研究	260
第二章 晚明对汉代历史的考证	263
第一节 焦竑对汉史的“去取精审，主于阐发”	263
一、考订《史记》所载史实	264
二、在汉史考证中敢于驳正权威之说	267
三、考证、注释《史》、《汉》中人名和典制	271

第二节 方以智“删古今聚讼为征,考而决之”的汉史研究	275
一、注重用小学之法研治《史》、《汉》	276
二、“辨当名物,征引以证其义”:考辨《史》、《汉》名物	278
三、“利弊时宜,贵知要领”:方以智对汉史研究的经世特点	280
第三节 对《史记》、《汉书》、《后汉书》的笺注“提其要,钩其玄”	284
一、郝敬刊正汉史文本的“注家诠释”	285
二、晚明其他学者对汉史文本及其注释的考证	289
第三章 “因原竟委,考正得失”:以顾炎武为个案的明遗民与汉史学研究	296
第一节 “错综其理,会通其旨”:从具体事实归纳汉史的普遍现象及其原因	297
第二节 “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顾炎武汉史研究的经世特征	300
一、“洞悉盛衰利弊,著其化裁通变之道”:顾炎武对两汉风俗教化的研究	300
二、“考汉世用人之法”:顾炎武对汉代官吏任用及权力分配的研究	304
第三节 “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顾炎武对汉史文本的考释	308
一、对《史记》的考证	308
二、对《汉书》的考证	311
三、对《后汉书》的考证	314
四、比较汉史诸文本的优劣	317
五、顾炎武汉史考证的瑕疵之处	318
第四章 晚明汉史的通俗化	324
第一节 通俗史学出现的原因	324
一、经济发展	324
二、文化需求	326
第二节 汉史通俗化的表现	328
一、汉史的摘抄本、简评本、演义本	329
二、通史的摘抄本、简评本、节选本	330

第三节 汉史通俗化的影响	332
一、汉史的普世化	333
二、正统学者对汉史通俗化现象的忧虑和非议	337
余论 明人汉史学研究的总体评价	
一、明人研究汉史学的特点	343
二、从明人与汉史学的关系看明代史学的发展脉络	346
三、汉史学研究对明代学术的影响	348
四、明人汉史学研究对清初汉史学研究的影响	356
五、明人汉史学研究的不足	364
附录	367
一、《千顷堂书目》中所列明人研究汉史著作一览表	367
二、明人《史记》、《汉书》、《后汉书》刊刻情况一览表	373
三、明人《史记》、《汉书》、《后汉书》评点、摘抄、节选情况一览表	375
四、明人汉史评论著作情况一览表	381
五、嘉靖时期官刻有关汉史学书籍情况一览表	384
六、《史记评林》中对汉史进行评析的明人及其著作一览表	385
七、《汉书评林》中对汉史进行评论的明人及其著作一览表	389
八、万历时期刊刻有关史汉的历史演义本情况一览表	392
九、《史记志疑》征引明人《史》、《汉》研究成果表	393
十、清人与明人汉史学研究观点相似处对照表	395
参考文献	397
后记	413



绪 言

史学是文化中的文化，是文化历程的集中反映。作为文化史的研究，不能忽视史学史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聚焦于明人汉史学的研究。

学界一般认为宋代是思想的勃发期，注重义理之学，而清代是中国学术的集结期，注重考据之学。这两个时期，无论是义理之学或是考据之学，都备受学人关注。处于中间之明代，学术上则受人冷落。“中国学术，建安、正始而还，天宝、大历而还，正德、嘉靖而还，并晚周为四大变局，皆力催旧说，别启新途。魏晋之故，迩来注意及之者已多。而晚唐、晚明之故，则殊少论及。”^①“明代中叶，在学术思想所发生巨大变化，也正好和中唐的情况差不多。正德、嘉靖时候所谓‘前七子’、‘后七子’者出，在文学方面产生了一次革新运动，这次运动的方向，是反对传统的‘宋文’；而在同时，却也发生了反对传统的‘宋学’的新学术，而下开清代的考据、训诂之学——所谓的‘汉学’。它的命运也和中唐一样。这次新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对旧传统文学的斗争，研究文学史者已多有所论述；而这次新学术的发生、发展却为人们所忽略。”^②对于明代学术，清人对其评价极低，认为它无非是割裂、拼凑和空疏之学。“凡清人之自号汉学家以讥诃明人为名高者，如清四库馆臣之流，动讥明人之学，而诋明刻之书，一概抹杀，实未了然于学术之流变。”^③近人由于受清人的影响，对明代学术亦没有好的评判。明代学术果如此乎？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来讲，明代应该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正如蒙文通所指明代学人在学术方面是清人的先导，“虽明人考据的条理化和精密程度都远不及清人，但先河后海、愈演愈密，亦势所当然，又何可以苛求于明人”。^④亦如白寿彝所言“明代史学的最大特点是没有出现多少光芒四射的巨星，而是像夏夜的天空布满了繁星，它们也许不那么夺目，甚至使人眼花缭乱，但对于

^{①②③④}蒙文通：《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16 页、第 192 页、第 145 页、第 193 页。

认识中国古代一个重要朝代的社会状况却提供了大史学家不可能留下的遗产”。^①有明一代二百七十多年，其历史可谓不短，学术的发展，并非如一潭死水，它亦有沉稳平静的涓涓小溪和跌宕起伏的滚滚浪涛。

本书试从明人与汉史学的关系入手探研明人对汉史学的研究，借以窥探明代史学的发展状况，从而可以更好地了解明代之学术。

明初朱元璋终身不离《汉书》，且“迁固之言与经训并传”^②；明中期大量《史记》、《汉书》刊刻^③，批点《史记》^④、《汉书》^⑤蔚然成风；晚明评论、考证汉史亦是蔚为大观。对这一文化现象，学界关注甚少，且局限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关于明代对《史记》、《汉书》的研究，只有从事文学研究的学人，从文学评论的角度来探讨《史记》、《汉书》的笔法、文体等；第二，学界对明代史论关注较多的是王夫之、李贽等较为醒目的几个大家，而对诸如《史记评林》、《汉书评林》、《历代史论》、《史说》等书则探究较少。即学界仅仅瞩目于明代一些大家的史学评论，而对其他一概抹杀或忽视，这不能从整体上来把握明代史学发展的状况。应注重一些不被看重的史家，或者说是史学研究者的成果。明人对汉代的史实评论、考证较多，但研究汉代史学的学者，往往借鉴唐、宋和清代对汉史的评论，而对明人的研究成果却不甚关注。向燕南在文中指出晚明是中国史学中史论最发达的时代，并列出诸如洪垣《史说》、于慎行《读史漫录》等不为清人看好的史论著作^⑥，由于此文的着力点是从宏观上论析晚明史论，对《史说》、《读史漫录》等史著没有作更深入的探讨。^⑦这说明明人汉史学的研究，还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第三，明人对前朝史学的研究，学界已涉及明人与元史学、与宋史学、与《史通》学、与《春秋》学的研究，对汉史学的研究则付阙如。^⑧鉴于明人对汉史的瞩目和热衷，而学界对此却甚少关注，因此本书定题为《明人汉史学研究》。本书的学术价值及其实践意义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助于加深对汉史的研究。学人在研究汉代人物或事件时，常引

^①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页。

^② 凌稚隆：《汉书评林》第一册，日本东京明治年间印刷会所版本，第18页。（按：以下文中引用《汉书评林》，皆为此版本）

^③ 参见附录五。

^④ 凌稚隆辑，李光缙增补：《史记评林·徐中行序》（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称：“其宗《史记》者，乃始盛于今日之百家”。（按：以下文中引用《史记评林》，皆为此版本）

^⑤ 据附录七可知仅对《汉书》进行评抄的就有八家。

^⑥ 向燕南：《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张扬与历史评论》，《史学月刊》2005年第4期。



绪

言

3

用唐、宋或清人对汉史的评论，而较少关注明人的评论，对于汉史研究的完善性来说是一大缺憾。因为明人对汉史的研究，在评论、考证方面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如柯维骐《史记考要》、杨慎《丹铅总录》、归有光《震川先生集》、焦竑《焦氏笔乘》、王夫之《读通鉴论》和《宋论》等。本文将明人研究汉史的情况进行梳理，从而有助于汉史研究的进一步加深。

第二，有助于扩大史学史研究的领域。首先，对于研究汉史的学者来说，对明人汉史学的研究还关注不够，就目前发表的论文而言，仅有几篇论及到明人对汉史的研究。依笔者目力所限，明代至少有上百本著作涉及对汉史的研究，有的是专论汉史的著作，有的是在通史或断代史研究中大量涉及汉史。如凌稚隆《史记评林》、《汉书评林》可谓是明代万历以前专门研究汉史的荟萃之作；钟惺《史怀》、何详《史取》、李贽《藏书》、《焚书》、《续焚书》、《初潭集》、程良孺《读书考定》、张隧《千百年眼》、郑郊《史统》等，其间有大量研究汉史的内容，且多有可取之处，但学界对此却少有注意。其次，对于研究明史的学者来说，有关明代的评点著作，仅注目于少数有影响的几部，不能从整体上反映明代史学发展的脉络和面貌。笔者力图通过此项研究，拓宽学界对明人史著的了解，进而扩大史学史研究的领域。

第三，有助于加深对明代学术特点及其影响的研究。笔者力图对明人与汉史学的关系作一梳理，从中洞悉明人汉史学研究的价值及其弊端所在，并由此探研明代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和特点，以及明人汉史学研究对前人的继承，和它对当世及清人的影响。

第四，有助于拓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与理解。史学是文化的集中反映，对明人汉史学的研究，有助于加强对明代文化史的研究。明人对汉史学的热衷，反映了当时统治者对汉初布衣将相格局的自我比附心理，并影响到一大批学者对汉史研究的兴趣。在明代的不同时期，不同层次的人士对汉史都有极大的关注，且出现大量摘抄、评点、节选汉代史著的本子。^①这一文化现象的产生肯定有其内在原因。^② 笔者力图从当时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探讨此文化现象的内涵及原因。

^① 参见附录三。董津南说：“才性兼备，人所仰首，名实不副，以虚名得之，其弊甚矣。”

^② 瞿林东指出明代“通俗的史学却在市井民众、乡塾蒙学那里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据清代四库馆臣著录，大多采自地方，说明它们在民间流布之广，自有其生成的土壤。至于明代通俗史学的既多且滥，其中不乏平庸、肤浅之作，或许正是史学之进一步走向社会深层的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史学现象。”（《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48—249页）

二、学术史回顾与前瞻

(一) 研究成果

明人受理学的影响,对以往史实评论较多,不像清人那样专注于考据之学,一些学者便认为明代是有史书而无史学,再者受清人对明代史学大加批判的影响^①,导致学界对明代的史学史不甚关注,这点从已经出版的史学史著作便可了解到^②。吴智和对此现象评道,“国人所著史学史在通论明代史

^① 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五,《史部·史抄类》,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97—898页)中对明人史著评价如下:方澜《读书漫笔》“上自《汉书》,下迄《唐书》,随笔采摘要其字句,兼及训诂,亦时论断其是非,发明殊鲜。”陈深《诸史品节》“自《国语》以及《后汉书》,皆随意杂钞,漫无体例。”凌迪知《两汉隽言》“补葺旧本,创立新名,是则明人之结习矣。”马维铭《史书纂略》“取‘二十一史’《本纪》、《列传》,各摄取大略,汇成一编。盖亦通史之例。然去取失宜,疏略太甚,非博非约,殆两无所居也。”吴士奇《史裁》“节录史文,始自春秋,迄于宋、元,杂采旧论,亦间以己意断之。既非编年,又非纪传,惟随意抄撮而已。”赵维寰《读史快编》“于诸史之中摘录其新异之事,始于《史记》,迄《新唐书》,割裂翦裁,漫无义例。”由以上所举数例可知,在清人眼中,明人所著之书,无非是断章取义,割裂之书,于学术无补。

^②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最早于1944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可以说是研究中国史学史中一本较好的教材,其中关于明代的史学仅见《明实录》、明修《元史》、《明史》、《明通鉴》等为数不多的几部书,而其他朝代的史书则研究较多,可见当时对明代史学的关注情况;(台湾)李宗侗《中国史学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自序落款为1953年7月,应为20世纪50年代之作。书中关于明代史学专列一章,但内容不是很多,书中涉及明代官修元史、官修及私修明史;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中关于明代史学仅列有《明史》,关于明代的史论仅有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刘节《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社出版1982年版)中介绍了明代的国史和野史(主要是关于明代历史的撰写)。对王夫之的史论专列一章进行讲述,但只是介绍性的,未能作深入之研究。对《明史》修订的经过亦专列一章。他认为“明代史籍与前代相比,自是多不胜纪。求其能自辟蹊径,独创一格者甚少。”(第285页)陶懋炳《中国古代史学史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评价明代史书“数量不为不多,但质量委实不高,尤其是史学思想很贫乏,远不及前代。”(第390页)朱杰勤在《中国古代史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认为“明代史学比宋代差得太远,没有庞大的著作出现,也没有独创的风格特点,但野史杂史最为丰富,亦有可述之处。”(第257页)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史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指出“明代的思想文化学术继承元代而来,理学在思想界仍占一统地位。……明代史论并没有什么高明、深刻的见解,大多是一些故作翻案文章的货色。……再就是借论史,大掉八股时文或冒牌古文的书袋。”(第272页)“嘉靖、万历之后,又有一些颇有影响的史论专著问世。但它们虽偶有卓见,却摆脱不了理学化史论那种严格的伦理纲常说教风气的束缚。”(第272—273页)李炳泉、邸富生主编《中国史学史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有关明人对前代史的编纂主要涉及元史及一些通史。对一些通史亦只是作简单介绍,未能深入研究。对明人关于前代史的研究可谓是提供一个线索,但有关明代大量摘抄本、节选本等未作任何介绍;张立文、祁润兴著《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列有“史学的兴盛”一章(第725—729页),其中只提了两宋史学,对元明史学只字未提,是否明代史学真无可写之处吗?有关明代史学不受学界重视的现象,孙卫国在《王世贞史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中亦有概述论及。



部分,所述多失之浮泛粗略,不然就是厚诬明人”。^①“历来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对明代史学或简单地一笔带过,或认为明代有史书而无史学,史学在明代是一个空白点,这恐怕不太公平。”^②在此情况下对有关明人汉史学研究的关注则更少。

目前学界对明人汉史学研究的相关内容,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总结:

1. 对明人汉史学研究的专论

学界人士已逐渐认识到明人汉史学研究的存在,且亦有学人对有关明人汉史学研究进行专论。俞樟华对明代学者有关《史记》论赞的研究进行了简单的评析。^③王健通过对王夫之《读通鉴论》中有关秦汉史实的评析,归纳王夫之的史学意识和史学理念。^④谢贵安指出朱元璋由于对刘邦的偶像崇拜,终其生都在研读《汉书》,并由此探讨了汉史对朱元璋的影响。^⑤此文可以说是对明人与汉史双向互动进行研究的一个典例。孟祥才、张平在文中分析了于慎行对汉代人物的品评情况。^⑥从以上几位研究者的治学背景来看,无论是研究明史者,还是治秦汉史者,已经关注到明人对汉史学的研究。

2. 有关明人对《史记》研究的探讨

《史记》在明代无论评点、摘抄或是翻刻,都有大量版本的流传,这样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明人对汉史学的研究。目前学界主要从文学的角度来探讨明人对《史记》的研究。王齐利用传播学和接受理论研究明代弘治到万历间对《史记》的接受与传播,主要分析了当时秦汉派和唐宋派与《史记》的关系,以及《史记》在当时的传播渠道和传播类型。^⑦此文主要是从文学的角度入手对《史记》进行探讨,所以对有关汉史史实方面的问题涉及较少。刘宁在其文中叙述了历代对《史记》叙事研究的大体状况,认为明清时期是研究《史记》的兴盛阶段,而明代研究《史记》之所以成果累累是印刷业的发达和科举

^① 吴智和:《何良俊的史学》,《明史研究专刊》1985年第8期,第4页。参见孙卫国《王世贞史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② 朱仲玉:《宋濂和王祎的史学成就》,《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4期。

^③ 俞樟华:《简评明清学者对〈史记〉论赞的研究》,《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④ 王健:《王夫之秦汉史论初探》,《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⑤ 谢贵安:《朱元璋的偶像崇拜及其政策走向》,《安徽史学》1993年第2期。

^⑥ 孟祥才、张平:《从〈读史漫录〉对战国秦汉人物的品评看于慎行的历史眼光》,《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⑦ 王齐:《〈史记〉在明代的接受与传播》,北京师范大学2005届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论文。

考试对写作的要求所致。^① 贺次君《史记书录》^②从版本学方面对明代所刊刻《史记》的评点本、钞本进行研究。杨燕起《历代名家评〈史记〉》^③对明代名家对《史记》的点评做了资料汇编,为探研明人对《史记》的研究提供了线索。张新科《史记学概论》^④指出明代是《史记》评论的兴盛期,《史记》研究成就最大的是对《史记》的评点,他从文学的角度对明代有关《史记》的研究进行了简介。另外张新科、俞樟华等著《史记研究史及史记研究家》^⑤叙述了明人评点《史记》的成就,并指出明代“史记热”的原因在于文学复古主义的出现、史钞史评的繁盛、印刷技术的提高。文中尤其分析《史记》与明代小说的关系。这四部著作对于明代《史记》研究的情况介绍较多,为学界对明代的《史记》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归有光评点《史记》在明代影响颇大,因此《归评史记》也备受后人的关注。王齐从对《史记》接受史的角度出发指出由于时代的需要和当时读者的认同以及科举制的要求,《史记》在明代被普遍接受并得到推崇。坊刻主受利润的驱动大量刊刻有关《史记》的点评本,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史记》内容在社会的传播。文中亦指出归有光不盲从《史记》,对其中的内容进行质疑和考辨。^⑥ 而贝京则认为归有光的史学根底较浅,尽管有对《史记》内容进行质疑和考证的地方,但都比较肤浅甚至有错误之处。但他同时指出归有光在《史记》、《汉书》的比较方面着墨较多。^⑦ 另外贝京认为归有光散文的风格对《史记》模拟较多,但只是形似而神不似,他还客观地评价了《归评史记》的学术地位。^⑧

茅坤对《史记》亦下功夫较大,曾著有《史记抄》九十二卷。后人鉴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言“是编删削《史记》之文,亦略施评点。然坤虽好讲古

^① 刘宁:《历代〈史记〉叙事研究综述》,《江淮论坛》2006年第3期。

^② 贺次君:《史记书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③ 杨燕起:《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④ 张新科:《史记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⑤ 张新科、俞樟华等著《史记研究史及史记研究家》,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⑥ 王齐:《〈归评史记〉对〈史记〉的接受》,《文艺研究》2005年第6期。

^⑦ 贝京:《归有光〈史记〉评点研究》,《中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2期。

^⑧ 贝京:《归有光散文与〈史记〉关系辨析》,《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夏之卷;贝京《归有光研究》(浙江大学2004届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论文)对归有光评点《史记》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并归纳了归评《史记》的价值及归文与《史记》的关系。